

【译 文】

自下而上的分离主义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民族主义和地方的责任¹

埃莉斯 朱利亚诺 (Elise Giuliano) 著, 罗秋实译²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俄罗斯联邦 (Russia) 面临着国家失败的危险处境。独立的要求从俄罗斯的族裔共和国不断向外扩展, 像曾经在苏联发生过的那样, 俄罗斯也面临着联邦内部族群分裂的威胁。在苏联时代晚期, 俄罗斯的各共和国就已经开始从莫斯科取得权力。当苏联解体时, 有几个共和国提出了更加激烈的要求, 宣称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公然反抗联邦法律, 并且设置共和国的总统的职位。一些共和国做出的联合抵制联邦选举并且停止支付联邦税收的决定, 推动了一个似乎可能导致俄罗斯瓦解的过程。

发生在俄罗斯的这些事件, 与东欧和苏联的事件一起, 共同引发了一场讨论, 这场讨论试图廓清分离主义的原因及分离主义与族群冲突还有国家解体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 分离主义在多族群的联邦国家中发展起来, 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性结构生产出认同、行动者和资源, 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族群动员同时弱化了中央国家。在这种视角下, 族群联邦主义 (Ethnofederalism)³ 导致了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裂。⁴ 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 坚持认为, 与上述说法刚好相反, 族群联邦主义减少了冲突并且有助于“保持和平”。⁵ 由于有一些俄罗斯的族群地区产生了分离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却仍旧保持沉寂, 因此考察俄罗斯就提供了一个机会, 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详细说明多族群联邦是否会产生并且如何产生地区性的分离主义。

这篇文章想要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分离主义会在俄罗斯产生? 为什么特定的共和国比另外一些共和国表现出更强的分离倾向? 这篇文章比较了俄罗斯下属的 16 个自治共和国, 这些自治共和国在苏联族群-地域 (ethnoterritorial) 的行政等级结构中, 地位仅次于加盟共和国。苏联领导人将自治共和国作为特定族群的居住地/“祖国” (homeland), 尽管在这些共和国内也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居住。与等级较低的自治州 (oblasts 苏联的行政区划名称) 和自治区 (okrugs 苏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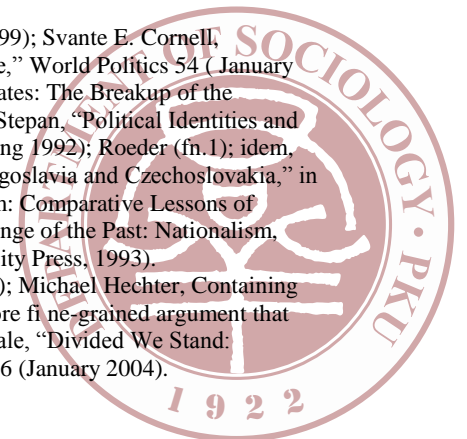
¹ 原文英文题目为 “Secessionism from the Bottom Up: Democratization, Nationalism, and Lo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 刊载在 *World Politics*, Volume 58, Number 2 (January 2006), pp. 276-310.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³ Philip Reeder 普及了这一术语的应用, 见 Re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January 1991).

⁴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vante E. Cornell, “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aucasian Conflict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54 (January 2002); Carol Skalnik Leff, “Democratiz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ist Federations,” *World Politics* 51 (January 1999);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2 (Spring 1992); Reeder (fn.1); idem, “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⁵ Nancy Bermeo, “The Import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 2 (2002);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enry Hale makes the more fine-grained argument that ethnofederal collapse is more likely when states contain a core ethnic region. See Hale, “Divided We St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thnofederal State Survival and Collapse,” *World Politics* 56 (January 2004).



行政区划名称)相比,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更像国家,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组织与信仰,宪法和一些族群性的语言教育。不仅如此,与等级较低的行政区域相比,自治共和国在联邦政府中被给予了更大的代表权,尽管这种权利是象征性的,并且自治共和国还被给予了有限的权利来决定地方的行政政策。¹为了保持权利、特权和制度性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的不变性,我只比较那些在1991年之前拥有自治共和国地位的地区。²除此之外,我集中考察自治共和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自治共和国像俄罗斯的州一样,在政治上比等级较低的行政区域更加重要。

后苏联的政治科学发展出了一种惯例化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思考方式称之为“财富假设(wealth hypothesis)”,这一假设试图通过集中考察共和国的结构经济条件(structural economic conditions)来解释存在于俄罗斯的分离主义。依据这种解释路径,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会被他们共和国的财富所激发,向莫斯科提出了分离的要求。相反,相对贫穷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则缺少这样的激励。³这种主张表明了一种一般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结构性经济条件诱使行动者支持分离以获取经济利益。⁴财富假设的逻辑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并非所有富裕的共和国都是分离主义者,而有些贫穷的共和国则提出了脱离的要求。因此,财富这个变量,并不能解释俄罗斯各共和国中存在的分离主义。⁵不仅如此,由于仅仅集中注意力于经济结构,财富假设没有办法解释,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的政治转型是如何影响到莫斯科与共和国领导人及共和国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解释路径则试图将政治带回到关于共和国分离主义的研究中。

我主张,苏联高度集中的一党体系(single party)的解体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催生了一场政治控制权的争夺,而这一争夺则决定了共和国向莫斯科提出的分离要求的力度。在改革后期的大转型过程中,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们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对莫斯科负责,而是对当地的选民负责。民主化过程的三个关键方面促成了这一责任的转移。首先,苏联共产党(CPSU)的解体结束了党的特权体制(nomenklatura system),以前在这一体系下,地区领导人根据由莫斯科提出的

¹ 但是实际上,所有族裔地区的自治都是非常有限的。Ruth Lapidoth, *Autonomy: Flex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² 因此,我排除了在1991年由自治州升格而来的那些共和国:阿地盖、戈尔尼-阿尔泰、哈卡斯和卡拉柴-切尔克斯。我也将印古什排除在外,它于1992年从车臣-印古什中分离出来。这些共和国很少表现出分离主义,因此他们对最初十六个共和国的分析没有影响。

³ 关于苏联共和国分离主义三个最为主要的比较研究是 Kisangani Emizet and Vicki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 (January 1995); Daniel S.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49 (January 1997); and Henry Hale, “The Parade of Sovereignties: Testing Theories of Secession in the Soviet Set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January 2000). 也见 Kathryn Stoner-Weiss, “Feder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Stephen White, Alex Pravda, and Zvi Gitelman,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9.

⁴ 这一逻辑最初由 Ernest Gellner, Donald Horowitz, Michael Hechter, Peter Gourevitch, 和 Tom Nairn 为我们勾勒出来。Gourevitch 和 Nairn 假设,在政治地位较为边缘的地区中,经济上相对发达的族裔精英会支持分离主义以发展他们地区的潜能。Horowitz and Hechter 从相反的立场主张,经济上的相对劣势会驱动族群性群体通过分离来增加他们地区的发展前景。见 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147–78; ide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83); Donald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 idem,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idem, “Group Formation and the 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no. 2 (1978); Peter Gourevitch, *Paris and the Provin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⁵ 使用相同的语气, Yoshiko Herrera 所做的关于俄罗斯主权运动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俄罗斯的非族裔地区中,地区性的财富差异并不构成主权运动的驱动力。相反,在特定的州里,经济利益是通过生产主权要求的方式被建构的。见 Herrera, *Imagined Economies: The Sources of Rus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党内名单来任命。第二，1990年举行共和国议会的首次半竞争性选举，将持有新观点的新代表们引入了曾经不经审查就得以成立的立法机构。第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使得非正式的组织得以出现并且允许使用诸如群众游行这样的底层策略。在一些特定的共和国中，那些最受欢迎的、最可见的和最能发出声音的组织变成了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运动，它们往往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但是时常被忽视的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变量。由此，自由化的上述三个方面一起，非常迅速地将俄罗斯的共和国由空洞的行政单元转变成为新的竞争性的政治角斗场，或者用卡罗尔·莱夫（Carol Leff）的话来说，转变成为“分离的且截然不同的政治市场¹”。

一旦我们认识到，上述处于核心地位的变化通过创造出一种地方控制权的竞争，重构了共和国领导人的动机，我们就有可能将下述论题理论化，这一问题关心次联邦的行动主体——拥有党内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领导人、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公众等——如何影响共和国对于莫斯科的分离主义。由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公开化政策的推进，一些俄罗斯共和国中的大众观点开始支持一系列的民族主义计划，它们要求获得与名义上的民族性相符的增长的权利，以及更大程度的共和国自治。²在那些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增加其影响的共和国中，集会活动中不断增加的人群以及在街道上或是地方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不断上升的地位这样一些明显的事实，表达出对现任领导集团一种显而易见的威胁。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们被迫从事民族主义的计划并且正式向莫斯科要求自治的权利。在另外一些共和国中，民族主义者取代了拥有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领袖们并且亲自领导要求主权地位的运动。这些事态发生在那些对联邦的权威构成最大挑战的共和国内：鞑靼斯坦、图瓦、车臣以及巴什科尔托斯坦。³相反地，在那些民族主义运动未能取得支持的共和国内，现任领导者能够忽略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同时能够免于被惩罚并保证自己职位的安全。

我主张，大众对民族主义的不同支持程度能够解释各共和国对莫斯科闹分离主义的不同水平。这一变量能够解释那些在财富假设下得不到说明的案例。虽然鞑靼斯坦、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这些分离主义共和国的资源确实相对丰富，但图瓦这个狭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核心的贫穷的共和国也存在分离主义这一事实，断然地否证了财富假设。同样，车臣的分离主义也无法在财富假设下得到解释。尽管车臣拥有一些原油和一条连接俄罗斯与位于巴库的精炼厂的输油管道，它也仅仅构成了1992年俄罗斯总产量的很小一部分，约1%；不仅如此，由于一个绕道这个共和国的输油管道项目正在进行，这些管道正面临着因多余而被放弃的威胁。⁴不管是从原料、人口规模、生活水平还是工业生产方面来进行测量，车臣和图瓦都属于俄罗斯最为贫困的地区，然而它们却位于最为激进的分离主义者之列。⁵还有，在科米，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存在并未激发分离主义，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共和国，拥有难以计数的煤矿和重要的油田和天然气田。财富假设既不能解释贫穷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也不能解释富裕国家中不存在分离主义⁶的事实表明，

¹ Leff (fn. 2), 210.

² Titular 这一术语是指其所在共和国以之命名的族群性群体，例如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人。

³ 除了当我们讨论1992年印古什分离以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时，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使用后苏联时期的名称以保持一致性。

⁴ Anatoly Khazanov,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219.

⁵ Oksana Genrikhovna Dmitrieva, *Regional'naia ekonomicheskaia diagnostika (Regional economic diagnostics)* (St. Petersburg: Izdatel'stvo Sankt-Peterburgskogo Universiteta Ekonomiki i Finansov, 1992), 128-32.

⁶ 相似地，俄罗斯最富裕的族裔地区，包括坎替-曼斯克和亚马尔-涅涅茨这两个自治州，同样也未能提出分裂主义的要求。尽管作为州的这些地区与共和国相比只拥有更少的机构、权利和特殊待遇，它们却远为富裕，因为它们生产着俄罗斯80%的油气。Roy Bahl and Christine I. Wallich,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Richard M. Bird, Robert D. Ebel, and Christine I. Wallich, eds.,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Socialist Stat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5), 326. 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邦关系已经稳定之后，州的领导们要求从秋明省获得更多的行政独立，以对他们的自然资源保持更大的控制权。见“Khanty-Mansi Avtonomnyi Okrug,” in *Regiony Rossii: Statisticheskii sbornik (Russia's regions: Statistical handbook)* (Moscow: Goskomstat, 1999).



我们需要提出另外一个解释来理解共和国分离主义中的各种变化。我将表明，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只存在于有分离主义的共和国中，而不存在于那些没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中。

如果大众的民族主义在驱动共和国分离主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话，那么它本身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现任领导人为了增强他们的共和国在与莫斯科进行谈判时的地位而故意激发的呢？¹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意味着现任者在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的时刻依然能够自主地行动。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耗尽了共产党的权力，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并且容许反对群体的形成，所有这些政策都损害了共和国内现任领导集团的自主性。不仅如此，认为共和国领导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大众投入到民族主义狂热中的观点，把精英们看作策略化的行动主体，而把大众看作被动的工具，他们要么：（1）是“真诚的”的民族主义者，在现实状态下耐心地等待机会，或是（2）苏维埃的从属者，忠实地听从他们的领袖的命令。² 这种解释路径简化了族群整个人口的情况，并且过高估计了族群性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基础的力量。相反，像俄罗斯非少数民族地区地区的公民一样，各共和国的居民们理性地采取行动，他们支持某个或另外一个政治家，并且偶尔才会转移或是取消他们的支持。

那么，社会大众支持民族主义的源由何在呢？在这篇文章提出的解释中，我将集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苏联经济失败的过程中，日益激烈的工作竞争是如何使得由民族主义领袖明确阐释的特定议题与作为整体的族群之间产生共鸣。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的族群成员不能充分地参与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因为在追求较好工作和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阻碍。他们强烈反对**命名族群**（*titular group*）³成员与俄罗斯人相比在社会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谴责歧视性的中央政府，认为惟有取得共和国的主权，才能够消除这些压制。然而，这些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与客观事实是相违背的，实际上，由于在族群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的官方政策的影响，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各共和国**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s*）在专业成就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者建构“族群间经济不平等”的做法依旧在民众中引起了共鸣，因为在一个异常不安全的环境中，这种观点为他们当前切身体会到的日益激烈的工作竞争提供了一个解释。通过使人们将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他们的社会认同即**族群性**联系起来，民族主义者将**族群性**政治化了。他们劝说人们相信，他们个人的生活机会依赖于他们**族群共同体**的政治命运。

这篇文章按照如下方式组织，第一部分通过引入对俄罗斯 16 个共和国分离主义的一种新的编码方式来界定因变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试图阐明：（1）共和国内部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的起源；（2）从 1898 到 1994 年间，共和国内分离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影响。在第二部分中，我用以证明大众民族主义（*mass nationalism*）起源的证据，建立在如下分析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对关于共和国劳动人口的族群构成资料的分析，然后是对民族主义者的宣言和在共和国内出版的报刊文章的话语分析。第三部分试图阐明大众民族主义影响了分离主义，使用相关数据来证明大众民族主义和共和国内分离主义、族群示威及族群暴力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关于三个共和国的案例研究将试图指出，图瓦和雅库特的大众民族主义在它们争取主权运动的关键时刻，影响了共和国对莫斯科提出的要求，而与此同时，马里埃尔较低水平的大众民族主义则在那里产生了相对较少的分离倾向。我将试图通过图瓦和雅库特这两个案例与马里埃尔的案例所做的比较，把作为自变量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变化范围最大化，因为前两个案例是俄罗斯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中的代表，而后者则是俄罗斯低分离倾向共和国的典型。不仅如此，图瓦和雅库特的比较研究将会对财富假设提出质疑，因为这两个共和国在富裕程度方面存在

¹ 这一主张可以从以下文章中找到，Roeder (fn. 2); Treisman (fn. 6); and Jeff Kahn, *Federalism,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6–32.

² Dmitri Gorenburg的工作是一个例外。他向我们展示出地方机构如何在俄罗斯共和国之间的大众民族主义动员中产生影响，Gorenburg, *Minority Eth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ale指出，大众与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但是他认为宏观经济因素均一地影响共和国中的所有行动者。见 Hale (fn. 6).

³ “命名族群”即是以该族群为自治共和国命名的群体，如鞑靼人是鞑靼斯坦的“命名族群”（译者注）。

很大差别（图瓦很穷，而雅库特则相对富裕），但是它们却同样都存在分离主义的倾向。在第四部分我将提出主要的结论。

第一部分 俄罗斯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

为了刻画俄罗斯诸共和国中分离主义的不同水平，我使用了一个 14 级的编码指标（14-point coding index），这一指标以由共和国发起的行动及在 1989-1994 年间它们对莫斯科政策的回应为基础。我的编码体系抓住了共和国挑战莫斯科的主要方式，并且改进了之前往往依赖于一个单独的指标的编码系统，它们忽视了核心-边缘地区关系的关键变化与发展，并且对图瓦这一重要的案例进行了错误的编码。¹ 这些指标（在下文中讨论，并在表一中列出）表明，最具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是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²

在最早的分离行动中，所有的自治共和国都发表了主张其主权地位的声明，这些声明是紧跟着 1990 年 6 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重要的分离声明做出的（指标 1）。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戈尔巴乔夫试图继续苏联的存在并抑制叶利钦权力的增长，后一目的是试图通过给予自治共和国更多的权利甚至暗示在“复兴的联邦”内自治共和国将取得与加盟共和国同等的地位等手段来实现的。³ 叶利钦同样向自治共和国承诺了在俄罗斯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对它们更大的承认，他告诉它们，“你们能够掌控多大主权，你们就将获得多大的主权”。⁴ 尽管叶利钦做出了这些努力，在 1991 年 3 月举行的关于创造一个俄罗斯联邦（Russia）（read: Yelstin）的全民公决中，诸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的其他地区相比，都更少人投票支持这一决定。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印古什和北奥赛梯甚至拒绝举行全民公决（指标 2）。⁵

在苏联解体之后，各共和国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共和国开始零星地（scaled）支持分离主义的活动，另外一些共和国则趁中央政府虚弱之机，开始设置总统的职位（指标 3）、起草宪法及通过语言法（指标 4），其中一些共和国将它们命名族群的语言（titular language）指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指标 5）。当叶利钦的休克疗法计划导致了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并减少了中央财政对地方预算的支持时，一些共和国开始截留税收收入和/或设立它们自己的税收政策。⁶ 以鞑靼斯坦、图瓦和车臣为例，它们“在 1993 年实际上停止上交他们的税收”，而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则常规化地延迟税收收入向莫斯科的移交（指标 6）。⁷

¹ 见 Emizet and Hesli's (fn. 6) use of the timing of Supreme Soviets' sovereignty declarations as a single indicator of secessionism (p. 500); and Treisman's (fn. 6) miscoding of Tuva (pp. 224-25).

² 主要的俄罗斯专家也将这些共和国视作最具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见 Valery Tishkov,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58; Leokadia Drobizheva, *Natsional'noe samosoznanie i natsionalizm v Rossiiskoi Federatsii nachala 1990-x godov*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early 1990s)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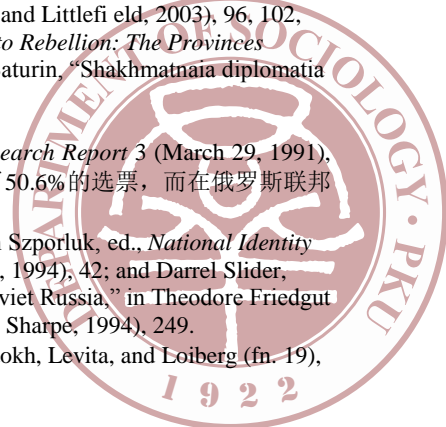
³ 因此，在 1991 年 3 月自治共和国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选区（82.6%）投票支持保留苏联。见 Edward Walker, *Dissolu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96, 102, 117; Vladimir Shlapentokh, Roman Levita, and Mikhail Loiberg, *From Submission to Rebellion: The Provinces versus the Center in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91; and Yurii Baturin, "Shakhmatnaia diplomatiia v Novo-Ogarevo," *Democratizatsia* 2 (Spring 1994).

⁴ E. Chernobrovkina, "Reshat' vam samim," *Vechernaia kazan* (August 10, 1990), 1.

⁵ Ann Sheehy, "The All-Union and RSFSR Referendums of March 17," *RFE/RL Research Report* 3 (March 29, 1991), 22. 1991 年 6 月总统选举的结果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叶利钦在自治区域中赢得了 50.6% 的选票，而在俄罗斯联邦（RSFSR）整体范围内获得了 58.4% 的支持。Walker (fn. 19), 117, 123-24.

⁶ Elizabeth Teagu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42; and Darrel Slider, "Federalism, Discord, and Accommoda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Theodore Friedgut and Jeffrey Hahn, eds., *Local Power and Post-Soviet Polit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249.

⁷ 印古什和北奥赛梯宣告破产并且也减少了向莫斯科的税收支付水平；Shlapentokh, Levita, and Loiberg (fn. 19),



一场俄罗斯联邦政府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之间的宪法危机和权力的争夺发展起来，促使叶利钦试图通过起草一部联邦协定（Federation Treaty）来保证诸共和国的支持，这一协定将成为新的俄罗斯宪法的一部分。这一联邦协定承认各共和国的主权并且保证族群性地域的特殊权利。尽管在 1992 年 3 月，大多数共和国在选举中通过了这一协定，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中，鞑靼斯坦和车臣却拒绝签署这一协定，而巴什科尔托斯坦则只是在莫斯科增加了一个确认其独立的附加条款之后才签署了这个协定。雅库特在谈判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一种对立的姿态，直到达成了一项允许其从行政区域内钻石和黄金开采所需缴纳的税收收入中截留一部分的协议之后，雅库特才签署了协定（指标 7）。¹

表 1.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分离主义指数（1989-1994）

	Tatarstan	Tuva	Chechnya	Yakutia	Bashkortostan	Kalmykia	Karelia	Buryatia	N. Ossetia	Komi	Kabardino-Balkaria	Chuvashia	Udmurtia	Dagestan	Mari-El	Mordova
宣布主权地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联合抵制 1991 年俄联邦全民公决	1	1	1						1							
设置总统职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通过语言法	1	1		1				1				1				
名义上的主导民族语言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1														
设立自己的税收政策/停止支付税收	1	1	1	1	1				1							
拒绝签署 1992 年叶利钦的联邦协定	1		1													
举行关于主权地位的全民公决	1				1											
采用宪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是否在新的俄联邦宪法之前？	1	1		1												
1 是否包含了分离的权利？			1		1											
1 共和国法律的优先地位？	1	1	1	1	1	1	1	1								
1 联合抵制/非法化叶利钦 1993 年 4 月的全民公决	1		1													
1 联合抵制 1993 年 12 月俄联邦宪法的全民公决	1		1													
分离主义指数	12	10	9	8	6	4	4	4	4	3	3	3	2	2	2	1

大约与此同时，特定的共和国中发生了高度不稳定的行为。在鞑靼斯坦，在一次关于国家主

169. 也见 Jeremy Azrael and Emil Payi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Ethno-Political and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Russi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98), 29.

¹ Teague (fn. 22); Vera Tolz, "Thorny Road toward Federalism in Russia,"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December 3, 1993); and Kahn (fn. 15), 126-32.



权的全民公决中，61%的人口投票表示赞同，而许多人将这次全民公决理解为一次要求独立的投票。¹ 一年以后巴什科尔托斯坦举行了一次类似的但是没有那么激进的全民公决（指标 8）。在另外一系列挑战中，大多数共和国采用了自己的宪法（指标 9）。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和雅库特在 1993 年 11 月叶利钦组织的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进行的全民公投之前就通过了它们自己的宪法（指标 10）。² 在图瓦的例子中，通过保证共和国法律对联邦法律的至高地位，及具体指定从联邦脱离的权力，我们看到了共和国宪法挑战莫斯科权威的最为大胆的例子（指标 11 和指标 12）³。

在 1993 年 4 月一次重要事件中，为了使反对改革的联邦立法机构非法化，叶利钦举行了一场关于他的领导地位和改革性政策的全国性全民公决。俄罗斯人口的大多数投票支持叶利钦，但是在各共和国中支持情况大为不同，16 个共和国中有 6 个投票反对叶利钦。⁴ 鞑靼斯坦和车臣甚至拒绝在它们的地域内举行全民公投，公然否定了联邦的统治（指标 13）⁵。到 1993 年 9 月，共和国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依然握有主动权，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宪法危机正到达紧要关头，而叶利钦在此时轻率地通过了一个解散议会的法令。在长达两周的僵持期内，议会代表们拒绝离开位于莫斯科的议会大厦，而有几个共和国在此期间则或者谴责或者漠视叶利钦解散议会的法令。但是，大多数共和国缓和了它们的立场，它们追随叶利钦的激进决定，剥夺了议会的权力并逮捕反对者。绝大多数共和国遵从了叶利钦随后发布的举行新的地方议会选举的命令，但是鞑靼斯坦和车臣顽强地联合抵制了关于俄罗斯宪法的全国性全民公决（指标 14）。⁶

一些分析者相信，叶利钦解散议会的举动转移了俄罗斯陷入分裂的风险。不管这种信念是不是准确，从俄罗斯宪法的通过开始，这些举动确实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莫斯科决定和几个共和国签署双边协定。然而当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事件发生时，即使在最为坚定的共和国中，大众民族主义也已经开始消退。早至 1993 年，正如部分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民族主义运动正在逐渐失去支持。这些情况表明，次联邦政治竞争的不断衰退导致了相对于莫斯科的分离主义的水平的下降。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各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中分离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叶利钦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改变了俄罗斯整体的制度性环境，将权力从各共和国议会转移到行政机构，并且消除了大量中央政府的虚弱之处，这些虚弱之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曾使得各共和国可以挑战联邦的主权。

将指向莫斯科的分离行动进行编码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共和国自身是否想要独立或政治自治。一些观察者区分了上述两种不同的要求，认为俄罗斯各共和国从始至终都仅只是寻求自治而已。他们准确地指出，只有车臣这一个共和国提出了明确的独立声明。但是，以此做出其他共

¹ 这一感觉在十天后来鞑靼斯坦拒绝签署联邦协定时得到了强化。Ann Sheehy, "Tatarstan Asserts Its Sovereignty," *RFE/RL Research Report* 1, no. 203 (April 3, 1992), 1.

² 实际上，这 4 个共和国的行动使莫斯科相信，有必要用一部新的联邦宪法代替联邦协定；Tishkov (fn. 18), 62.

³ 大多数宪法宣称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并同时给予俄语与族群语言官方语言的地位。见 Teague (fn. 22), 43; Kahn (fn. 15), 82-84; and Gorenburg (fn. 16). 关于宪法的全文，见 Iu. A. Dmitriev and E. L. Malakhova, *Konstitutsii respublik v sostave Rossiiskoi Federatsii* (Republican constitu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Izdatel'skaia Firma Manuscript, 1995).

⁴ 巴什科尔托斯坦、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埃尔、楚瓦什、摩尔多瓦和印古什投票反对叶利钦。在图瓦，大多数人在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上认同叶利钦，但是早些时候反对叶利钦的总统选举中投赞成票。Wendy Slater, "No Victors in the Russian Referendum,"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May 21, 1993). 但是，一场反对叶利钦的投票并不必然是对联邦的权威的挑战，因为一些共和国投票反对他是为了表明它们对最高苏维埃关于保留对地区补贴这一保守政策的支持。Ralph Clem and Peter Craumer, "The Geography of the April 25 (1993) Russian Referendum," *Post-Soviet Geography* 34 (October 1993).

⁵ 当鞑靼斯坦的行政部门阻碍选举，结果导致只有 22.6% 的选民参加选举从而使得选举结果无效时，车臣也联合抵制了这场全民公决。

⁶ 7 个共和国投票支持这部宪法，5 个共和国投票反对，还有 2 个共和国选民投票率低于 50%。Gail W. Lapidus and Edward W. Walker,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Federalism: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 Gail Lapidus, ed., *The New Russi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100-101. On local elections, see Elizabeth Teague, "North-South Divide: Yeltsin and Russia's Provincial Leaders,"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vember 26, 1993).

和国只是想要自治而非独立的结论，可能会犯一个错误，即通过观察到并未分离这一最终结果来推断那个时刻行动主体的意图。我认为，这种解释路径误解了分离运动的动态变化和政治本性。地区性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无法直接从他们的陈述和策略中发现，因为这些主观意图随着政治机会不断地转移和变化。

正如罗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所说，行动主体的“需求可以从自治转向独立，也有可能再转变回来，这取决于中央政权与分离主义者之间协商谈判的具体状况。”他主张，**脱离和分离**这些词汇应该不仅指独立运动，它也指称那些“寻求任何以领土来界定的政治变化，这些变化试图使一个族群在他们居住的地域内获得自主的控制权。”¹在俄罗斯的诸共和国中，温和的自治主张有可能转向更激进的要求，也有可能随着时间消散掉。因此，在分析分离主义时，地区性行动主体的意图不能按照如下方式推断：即假设没有脱离的结果可直接表明他们在前一段时期内的偏好倾向。²将**分离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将“为什么分离的需求会强化或减弱”的问题理论化。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应该被视作一个多元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变化发展的产物，而非一个一元行动主体固定的偏好。在俄罗斯的例子中，向莫斯科提出的分离要求是从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任领导人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在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一关系之前，我在下一部分将阐释共和国中大众民族主义的源由。

第二部分 大众民族主义的源由

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在一个工作竞争不断加剧的正在衰退的经济中，由民族主义者明确阐释的特定议题与族群整体对丧失生活机会的恐惧产生了共鸣。民族主义者将这种状况归因于**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在寻求工作和资源的过程中受到了阻碍。族群成员被假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在从属于俄罗斯人的地位，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内被排除在对工业化经济生活的充分参与之外。民族主义者将这种严重的不公正归责于莫斯科的政策而非地方上的俄罗斯族成员。他们主张，成功地获得国家主权将会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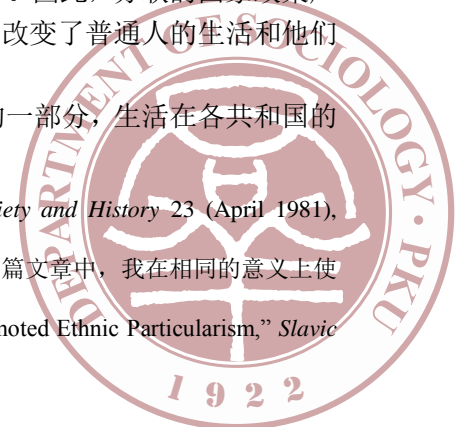
荒谬的是，民族主义者关于族群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框架与**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不断增加的专业化和成就的现状是相矛盾的。在苏联时代初期，存在劳动力的族群分割，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各共和国中命名的主导族群在农村地区居住和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族成员的绝大部分在城市中从事更加需要熟练技能的工作。然而，苏联政府决定通过特殊的关于工业化、城市化、公共教育、俄国化和本地化的政策，来推进各**命名族群**的发展。**本地化**的政策保证**命名族群**成员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内享有在教育、经济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中更多的优先地位，并且通过将农村地区的居民移居到正在工业化的苏联城市中来使他们“无产阶级化”。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各共和国中命名的**主导族群**从这些配额政策中获益，他们从农场来到工厂，并且和俄罗斯族的成员一道获得工作。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各共和国**命名族群**的成员不仅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共产党内工作，同样也在经济管理部门中工作。因此，苏联的国家政策产生出了居住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的少数族群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也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和他的家庭。

与此同时，作为发生在苏联的更大范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的一部分，生活在各共和国的

¹ Donald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April 1981), 168-69.

² 这个假设犯了追溯性的决定论（retrospective determinism）这一谬误。在这整篇文章中，我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 secession, separatism 和 autonomy campaign 这三个词。

³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Summer 1994), 433. See also Roeder (fn. 1); and Suny (fn. 2).



俄罗斯人口也逐渐迁移到城市。¹因此，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在绝大多数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在白领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与他们在整个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尽管直到 1989 年，一些贫穷的共和国中依然存在着劳动力的族群分割，但是即使在这些共和国中，命名的**主导族群**的情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举例来说，在图瓦共和国，1989 年有同样数量的图瓦人和俄罗斯人获得高等教育的学位，而在 1979 到 1989 年间的车臣共和国，车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俄罗斯人。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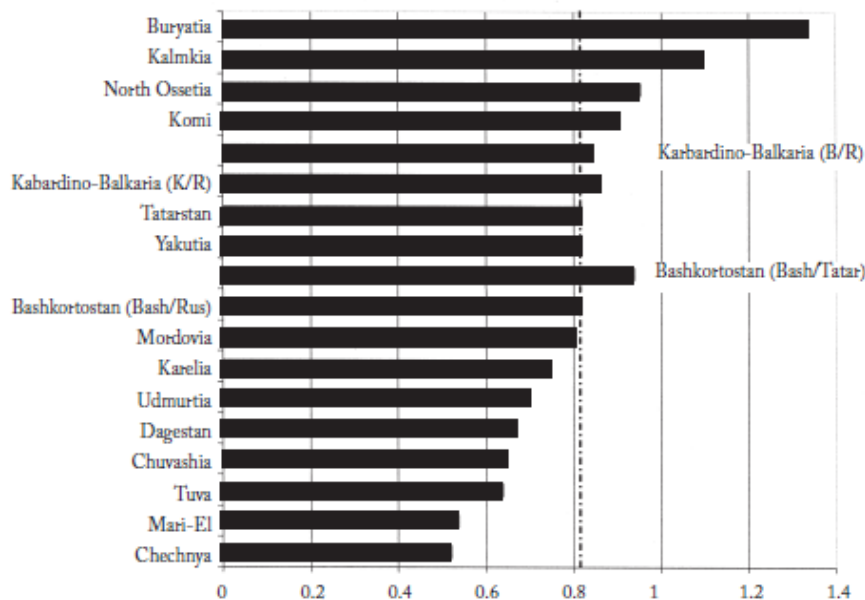


图 1. 白领劳动劳动人口中，命名族群与俄罗斯族代表性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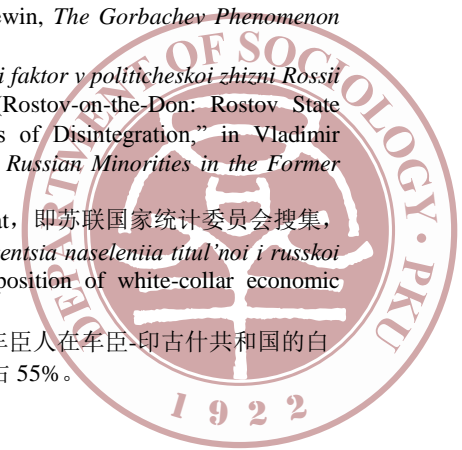
图 1 展示了这种巨大的社会流动，它表现的是，与每个共和国中各族群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比，在白领劳动人口中**命名族群**的成员与俄罗斯人的代表性的比率。³数值为 1 的比率表明的是，与他们在总劳动人口中的百分比相称，**命名族群**的成员与俄罗斯人在白领工作中拥有一样的代表性。数值大于 1 的比率则意味着，与俄罗斯人相比，**命名族群**的成员在白领工作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他们在共和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一个衡量各群体在劳动力人口中整体代表性的比例的比率，数值小于 1 则表明，与俄罗斯人相比，**命名族群**的代表性低于应有水平。所有共和国的平均水平是 0.814（见图中虚线），这表明，在大多数共和国内，俄罗斯人在白领工作中的代表性只是稍稍不合比例地高于**命名族群**的成员。⁴正如可能预期的，**命名族群**的成员在共和国农村地区构成了白领工作人员的主体。但是，他们同样在令人羡慕的城市经济生活的高层集团中有很

¹ Moshe Lewin 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这些过程如何转变了整个苏联的民众。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² 对于雅库特共和国中的雅库特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G. S. Denisova, *Etnicheski faktor v politicheskoi zhizni Rossii 90-x godov* (The ethnic factor in Russia's political life during the 1990s) (Rostov-on-the-Don: Rostov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1996), 86–88. 也见 Leokadia Drobizheva, "Processes of Disintegration," in Vladimir Shlapentokh, Munir Sendich, and Emil Payin, eds.,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Russian Minorit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47.

³ 这些比率是由作者根据一些未出版的原始资料汇编的，这些资料由 Goskomstat，即苏联国家统计局搜集，是 1988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一部分。见 *Professional'no-otraslevoi sostav intelligentsia-naseleniia titul'noi i russkoi natsional'nostei absolytnie znacheniiia* (Titular and Russian ethnic group composition of white-collar economic sectors). 感谢 Dmitri Gorenburg 为我提供这些资料。

⁴ 仅仅只是在车臣和马里埃尔，俄罗斯人才在白领工作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车臣人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白领劳动人口中占 40%，在总劳动人口中占 54%，车臣人在共和国的总人口中占 55%。



好的代表性，同时与他们在几乎所有共和国总人口中的人数比例相比，他们作为企业主管的数量都与之持平甚至超出这一比例。¹（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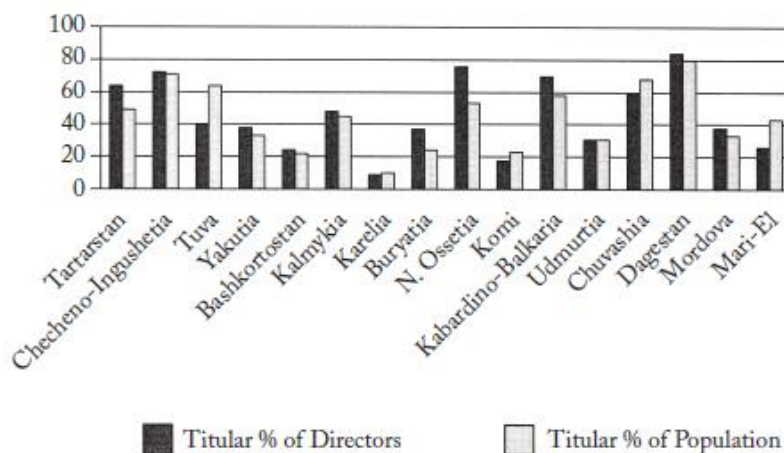


图2. 命民族群在企业管理者中的百分比与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的比较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的宏观经济衰退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进一步激化了。大范围的消费品和食品短缺，加之在叶利钦取消价格控制之后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都使得苏联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极为不稳定。这意味着，对白领工作的需求上升了，但是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却停止了增长。那些期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沿着熟悉的、国家设置的轨迹——中级教育之后是高等教育或技术训练，随之是安全的工作机会及沿着职业阶梯不断上升的前景——发展的人们，开始变得对国家是否还会继续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工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氛围中不断增加的劳动力竞争导致人们体验到了物质上的不满足和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但是如果这种发展趋势影响到了所有的公民，为什么只有共和国内名义上的主导族群以支持民族主义对之做出回应呢？苏联的企业并不正式地按照族群界线来组织工作申请或采取集体工作的形式。²并且人们也有阶级、地域、专业、代际和国家认同，而不仅仅是族群认同。为什么他们将自己设想为沿着族群的边界进行竞争呢？

在特定的共和国内，人们之所以开始将他们自己是做一个族群-国家的（ethno-national）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在特定的时刻改变了族群认同的意义。民族主义者对在资源和工作获取方面的不平等等问题的构建方式催生了一种群体感，这种群体感与特定的政治利益联结在一起。这些问题框架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民族主义者宣称，当俄罗斯人占据了城市中的特权位置时，**命民族群**却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最好教育的那些最好的工作被“给予”了俄罗斯人，迫使**命民族群**的成员处于一种从属性的社会地位。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框架不仅忽略了苏联促进**命民族群**成员（titular）流动的国家政策，同时也将各共和国内**命民族群**刻画成被苏联及俄罗斯人所迫害的对象。通过宣称自身的受害者地位并谴责现在的国家体制，民族主义者由此能够主张，**命民族群**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的祖国内成为俄罗斯人的“从属者”，而这种情形背离了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张“政治的和民族的（national）单元应该是一致的”。³在由民族主义者阐发的种种问题中，那些关注阻碍族群经济平等的议题引发了最强烈的共

¹ 马里埃尔和图瓦是两个例外，尽管图瓦人在图瓦的管理人阶层中占了40%。见 *Narodnoe khoziaistvo RSFSR (The economy of the RSFSR)* (Moscow: Goskomstat, 1989).

² 根据族群竞争理论，由于群体开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环境中就资源展开竞争，尤其是当伴随着突然的宏观经济变革时，不断加剧的工作竞争可能会引发族群动员。Frede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Susan Olzak,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³ Gellner (fn. 7, 1983), 1.

鸣，因为它们为面临不断增强的工作竞争的**命名族群**成员提供了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解释。人们开始相信，由于他们在一个俄罗斯国家中保持了非俄罗斯的族群认同，他们的生活机会受到了限制，因而他们开始支持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即确立族群-民族的（ethno-national）国家主权。

对由民族主义者在（1）他们的成立宣言和（2）1989-1994年各共和国出版报刊文章中阐发问题所进行的比较性话语分析表明，关于族群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框架出现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这些有民族主义思潮的共和国中，而在其他共和国中，**命名族群**成员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失败了，摩尔多瓦和马里埃尔的例子表明了后者。¹我的分析考察了这一问题的三个维度：民族主义者如何将一种社会情境界定为“不公平的、无法忍受的并且应该得到改正的”；他们如何将不公平情形的责任归于一个行动主体或是一系列社会过程；还有就是，他们如何确定消除这些不公平的方法。²举例来说，一个雅库特的民族主义者将采矿业中雅库特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不平等描述为不公平，指责苏联政府给予俄罗斯人特权，最终把雅库特人获取国家主权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苏联……不但忽视了公民间的平等，更忽视了整个民族……不仅高收入和特权被给予了那些来采矿业工作的移民，包括北部的工资补贴、住房、最好的供应品。……仅仅在1961年，当向雅库特的本地居民发放工资补贴的时候，存在部分的平等。所有其他主要的特权都保留。……只有主权……能够调节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并防止这个共和国的本地居民中出现大量的贫困。³

相似地，民族主义组织**鞑靼公众中心**（Tatar Public Center）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宣称，由于处于从属于俄罗斯的地位，鞑靼民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它主张，从苏联时期的一开始直到今天，鞑靼人在农村地区的数量都超过了俄罗斯人，并且呈现出更为缓慢的城市化过程和“较低的专业资格水平”。这个组织于是据此提出了一些特定的解决方法，例如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控制“族群的构成”，帮助农村地区的鞑靼人在共和国的城市中取得工作，并且在经济生活中为鞑靼人提供保留的位置。⁴

因此，民族主义领导人并非通过简单地使用预先存在于族群中的态度偏好来吸引民众的支持，而是通过用**族群话语**来阐释经济问题的方式来积极地在民众中创造出怨恨。民族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仅仅表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自己恰恰就是他们试图破坏其权威的苏联政府政策的产物。他们集中关注关于专业流动、平等的族群代表性和个人进步的实际问题，正是重复了典型的苏联时代晚期的官方理念。民族主义者为了获得现代化的好处而坚持其共和国具有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时，并未看到他们所坚持的这些理念正是由苏联国家最初予以阐明的。像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只是使用了一系列现存的信念和实践来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提出，民族共同体应该实现其对国家的控制。⁵

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对民族主义不断增加的大众支持并不意味着整个族群突然全部被民族主义者的主张说服。相反，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十分多样化，许多人对民族主义缺乏兴趣甚至充满敌意。甚至在最具分离倾向的共和国中，大众的支持在空间的分布上也是有差异的，与

¹ 通过在莫斯科两个图书馆中的工作，我从俄罗斯联邦这16个共和国中，从每一个共和国中出版的至少两份报纸5年中的全部内容中进行精选。我收集了4,100篇不同程度上关注族群政治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标准的新闻报道、政治领袖做的官方声明、社论、写给编辑的信以及民族主义杂志的声明。

² 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献认为这些维度是非常重要的。见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7; 和 David Snow and Robert Benford,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000).

³ V. Kopylov, “Kogo pugaet suverenitet?” *Yakutia* 14 (October 1992), 2.

⁴ Damir Iskhakov, *Sovremennie natsional'nie protsessy v respublike Tatarstan* (Current ethnic processes in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Kazan: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⁵ 这强调了John Breuilly的论点，他认为民族主义不是“预先存在的政治形式的民族价值和实践的表达”。见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69.



在许多前加盟共和国中的情形如出一辙。¹ 尽管俄罗斯各地的民族主义动员基本上具有暂时性的特征，事实依然是，呈现明显差异水平的大众民族主义在许多共和国中确实存在。尽管作为中央政权内部瓦解的结果，所有的共和国都面临着流变的和模糊的情境，但是只有某些共和国抓住这个机会向莫斯科提出真正的脱离要求。在分析大众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分离主义之前，我将首先在下文描述处于核心地位的民主化过程是如何摧毁垂直的责任体系并迫使共和国领导人们对地方的诉求做出回应。

第三部分 民主化、责任的转移和民族主义

在苏联时期，政治责任从中央到地方垂直运作，因为莫斯科的共产党依据党的特权体制（*nomenklatura system*）任命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区域性的党领导在中央决定的基础上被任命或被解职。² 这些拥有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领导人在他们的共和国内控制了党和管理机构干部的任命。³ 但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一项策略，将权力从苏联共产党的手中逐渐转移到政府、特别是联盟的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手中。1988年他取消了党中央组织的权力，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取消了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这一条曾经确保了苏联共产党的垄断权力。⁴ 在1991年政变企图失败后，共产党所剩无几的合法性迅速枯竭，苏联的立法机构暂停了所有党的活动。两个月后，叶利钦在俄罗斯正式取缔了共产党。⁵ 随着共产党的解体，苏联最主要的整合机制消失了，并打碎了地方领导人对中央的责任关系。

戈尔巴乔夫1990年举行半竞争性选举，以联邦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或最高苏维埃（前苏联最高立法机构）替代共产党特权体系（*nomenklatura*）的决定，同样损害了苏联的垂直责任体系。尽管在议会中拥有党内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人仍然占据了大多数席位，⁶ 但是独立的代表们现在开始在许多共和国中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些独立的代表们将一些几年前无法想象的新观点带到议会当中。竞争性选举将不经审查就被批准的苏维埃（委员会）转变成为由没有太多政治和行政经验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后者的合法性来自地区内的选举，而不是依赖于莫斯科的授意。⁷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政策还进一步使反对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反对群体可以公开阐述他们不合正统的观点，而不用担心会遭到国家的严厉压制。⁸ 赞成民主、保护环境和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的群体出现了。在一些共和国中，民族主义的支持基础仍然局限在中心城市的知识分子这一小群体中。但是在其他地方，民族主义的普及程度上升了，因为工人和党员也加入到教师、大学生和政府官员的行列中来。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反对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出一大批的追随者。

¹ 见 Andrew Wilson's discussion of nationalism in Ukraine in Wilson, *The Ukrain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 Jeffrey Hahn, "Introduction: Analyzing Parliamentary Development in Russia," in Hahn, e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The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³ Olga V. Kryshchanovska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Nomenklatura into a New Russian Elite,"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37 (July–August 1996).

⁴ Kotkin (fn. 46), 75–85.

⁵ Stephen White, Graeme Gill, and Darrell Slider,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Shaping of a Post-Soviet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⁶ 只有在摩尔达维亚、波罗的海诸国和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以及乌克兰部分地区中，独立的候选人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赢得了有显著意义的席位数目。

⁷ 举例来说，在鞑靼斯坦，民族主义者在最高苏维埃中赢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并且通过将独立的代表争取过来，他们几乎控制了250张选票中的120张。见 I. V. Terent'eva, R. Iu. Beliakov, and M. F. Safarov, *Politicheskie partii i dvizhenie Respubliki Tatarst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Tatarstan) (Kazan, 1999); and Gorenburg (fn. 16), 135. See also Gavin Helf and Jeffrey Hahn, "Old Dogs and New Tricks: Party Elites in the Russian Regional Elections of 1990," *Slavic Review* 51 (Fall 1992).

⁸ 见 Herrera 关于打破苏联限制(pp. 98–142)的讨论(fn. 8)。



被视作新选区的共和国领袖们开始抓住这一政治的主动权。通过在办公室观察在中心广场上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通过阅读地方报纸上激情洋溢的辩论，通过监控民族主义团体的活动，他们意识到了民众对民族主义支持的上升。被当作苏联既定秩序的主要支持者的他们，开始成为反对腐败和治理不当的有组织运动的攻击目标。举例来说，巴什科尔托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反对者发动了一场反对共和国共产党委员会的民众运动，并导致党委会的权力被解除。¹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试图取代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尽管这些举动并未取得成功，在全国性代表大会中提出的一些要求仍旧促使该国最高苏维埃对之做出回应。例如，当1990年在车臣全国代表大会（Chechen National Congress）的成立会议上通过了一个主张国家主权的决议时，车臣的最高苏维埃在几天之后做出了同样的决议。

最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组织在政府建筑物的前面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和布置警戒哨（picket），少数情况下还有绝食抗议，如此一来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举例来说，在1987到1994年间，鞑靼斯坦发生了142次民族主义示威，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1991年10月，一场要求独立的最为激进的集会持续了数天。当示威者听到消息说最高苏维埃已经投票否决了独立声明时，他们冲进了大厦。正如一位议会代表回忆的：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人群、那些多达数千人的的人群如何从早到晚包围着我们位于自由广场上的议会厅，他们如何将 Fauzia Bairamova（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领袖）偶像化，这位领袖宣布要从俄罗斯脱离出来。这太可怕了。我担心这类事件有可能令人担心地发展成为一场内战。我记得……当我们这些代表从议会出来的时候，保安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将人群挡住……人群向我们投掷玻璃碎片和钉子。²

这些行动引发了公众的讨论并得到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因为采取这些行动的示威者冒着被逮捕、失去工作甚至身体受伤的危险，表现出他们对理想的强烈承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民族主义者在特定的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和可资利用的资源。

对于那些不习惯考虑大众观点的特权体系中的党政（nomenklatura）领导人来说，行差踏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鞑靼斯坦的总统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Mintimir Shaimiev），在他支持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抑制信息传播并逮捕那些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变领袖的人之后，他学到了这一课。政变失败后，反对群体发动了一场民众运动来弹劾沙伊米耶夫。他最终得到了宽恕，因为民族主义团体认为，作为一个鞑靼人，沙伊米耶夫能够在根本问题上支持他们的利益。沙伊米耶夫于是宣布他支持共和国取得主权。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一开始实施，民族主义者就开始鼓吹这一主权地位。³作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党组织的官员，沙伊米耶夫一会儿支持保卫苏联的行动，一会儿又要求独立国家主权，这一事实使我们想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机会主义，正是这种政治机会主义在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产生出了分离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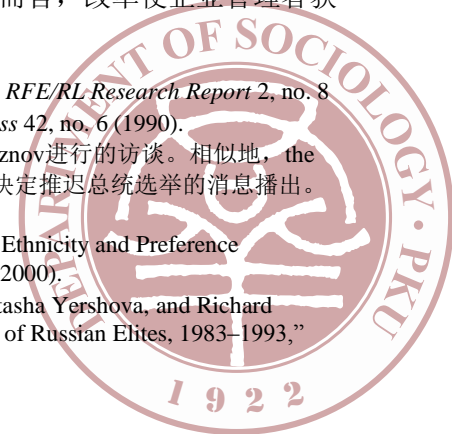
各共和国领导人们甚至不能指望企业管理者来继续保持现状。工厂和矿山的管理者都有支持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共和国主权的经济驱动力，因为他们能够趁中央政府虚弱之机，增加他们对自己管理下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一些管理者已经开始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则在市场上出售在他们管理下的国有企业的产品。⁴一般而言，改革使企业管理者获

¹ 随后，几位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加入到共和国过渡性的领导集团中。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 8 (February 23, 1990); 及“Plenary Sessions Held,”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2, no. 6 (1990).

² Jeffrey Kahn 1997年6月在喀山对喀山州立大学法学教授 Boris Leonidovich Zheleznov 进行的访谈。相似地，the Union of Bashkir Youth 向巴什科尔托斯坦的电视台行进并将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推迟总统选举的消息播出。RFE/RL Research Report 3, no. 47 (November 22, 1991).

³ 见 Elise Giuliano, “Who Determines the Self in the Poli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Ethnicity and Preference Formation in Tatarstan’s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32 (April 2000).

⁴ 这些从戈尔巴乔夫通过了1987年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之后开始。Eric Hanley, Natasha Yershova, and Richard Anderson, “Russia—Old Wine in a New Bottle? The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ssian Elites, 1983–1993,” *Theory and Society* 24 (October 1995).



益，因为改革使得他们不再需要遵守经济计划，也减少了莫斯科各部门对他们的监控。¹由共和国主权地位所提供的地方控制力的增长能够进一步扩大这些利益。这种自主权是在他们的共和国发起争取主权运动的直接结果。

除此之外，在特定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主义的示范效应，扮演着对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领导人警示的角色。和他们自己民众一起，他们共同看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群众是如何将普选出来的格鲁吉亚总统胡尔季阿（Gansukhurdia）和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Mutalibov）强行赶下台的²。因此，当各共和国领导人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使用**族群关系动荡**这一威胁时，他们并不简单地只是为了增强他们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类行为所蕴含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在民族主义集会、密集的公众讨论和偶尔的暴力行为中得到典型表现的大众所持的观点，完全能够转过头来反对这些官员自身。与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客一样，各共和国的领导们希望能满足他们的选民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向莫斯科去要求主权地位的行为，是由他们自身的个人利益激发的。

一个替代性的假设是，影响分离主义的关键变量是共和国的现任领导集团是否在民族主义团体形成后迅速对他们进行压制或安抚，从而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赢得公众的支持并向地方领导人施加压力。但是当我们对不同的共和国进行比较时，我们并未在成功的压制/安抚与较弱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压制/安抚的缺失与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的流行之间发现相关关系。大多数共和国中党的领导阶层的变化是1989年人事改革、1990年苏联选举和1991年反戈尔巴乔夫政变的结果，所以，这种变化的现象并不是因为领导阶层没有能力压制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么做不感兴趣。举例说，楚瓦什的领导层由于民主的反腐败运动岌岌可危，同时也未能控制1990年的议会选举，并最终因为支持8月政变而被罢免。³这就为楚瓦什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吸引民众支持的机会，尽管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同样，在各共和国保持权力的保守派也并不一定压制或安抚民族主义运动。在马里埃尔，一个保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取代了一个保守的奥伯康（Obkom）领导人，但是民族主义团体马里联盟（Mari Ushem）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推出了一位总统候选人。除此之外，马里联盟（Mari Ushem）也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民众支持。⁴最后，在鞑靼斯坦，在权威集团早早便使用压制策略来削弱民族主义团体的影响时，民族主义团体依然能够赢得支持。简而言之，各共和国的领导层在这段时间内受到挑战，并且行政官员们未能控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⁵。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开始衰退的时候，各共和国的总统们开始能够漠视他们虚弱的反对者并强化他们自己的权力。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要求主权的运动

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一种是将民族主义候选人选进共和国的立法机构这类直接的方式，另一种是对关心自我保存的现任领导人施加压力这类间接的方式。我将提供两类证据来证明大众民族主义对共和国分离主义的影响。首先，我将表明，共和国中族群性示威的数量和族群性暴力的实例与共和国分离主义的水平或指标（表1）有相关关系。下面四个图刻画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关于图瓦和雅库特的个案研究证据向我们

¹ 正如之前的特权体系中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例如，石油公司 Tatneft 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结构重组并继续由鞑靼斯坦苏联时代的管理者进行控制。见 Leo McCann, “Embeddedness, Markets and the State: Observations from Tatarstan,” in McCann, ed., *Russian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及 Jozsef Borocz and Akos Rona-Tas, “Small Leap Forward: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Elites,” *Theory and Society* 24 (October 1995).

² White, Gill, and Slider (fn. 50), 103.

³ Gorenburg (fn. 16), 62–63, 72.

⁴ Timur Muzaev, *Etnicheskii separatizm v Rossii* (Ethnic separatism in Russia) (Moscow: Panorama Publishers, 1999), 159–63.

⁵ White, Gill, and Slider (fn. 50), 101.



表明，大众民族主义如何增加了这些共和国向莫斯科提出的脱离要求，而来自马里埃尔的个案研究的证据指出，低水平的大众民族主义将那儿的分离主义保持在最小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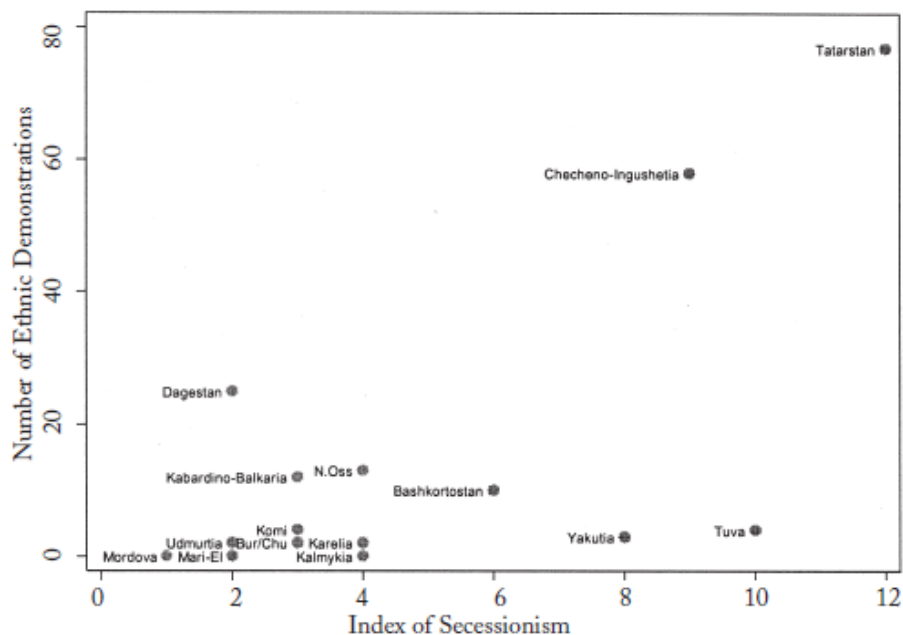


图 3.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示威活动的数量（纵坐标）与分离主义指数（横坐标）的关系

对族群性示威的参与刻画出人们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因为它表明采取有风险的行为去表达他们对当局权威的反对意愿。同样，一个人决定走到街上去，这是他对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公开宣称。¹ 在图 3 中，我们观察到在示威的数量和拥有最高分离主义得分的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这两个变量显著相关 ($0.661; p \leq 0.005$)。² 比如，最具分离倾向的鞑靼斯坦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分别有 77 和 58 次示威，而最不具有分离倾向的马里埃尔一次示威活动也没有。然而，在其他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很少有示威活动：巴什科尔托斯坦 (10)、图瓦 (4) 和雅库特 (3)。这种情形可以由以下事实进行解释，即一些民族主义团体选择在地方选举中提名候选人而非进行示威活动的策略。不仅如此，有些共和国的示威活动的数量在这个研究中可能没有得到充分代表，因为我在这里使用的数据集的采集时间截止到 1992 年，但是各共和国争取主权地位的运动却一直延续到 1994 年。

¹ 见 Mark Beissinger 关于民族主义事件意义的讨论；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28.

² 族群示威活动和族群暴力这两个变量是从 Mark Beissinger 关于苏联动员事件的数据集中得到的。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些资料。Beissinger 将族群示威活动定义为“人群的自愿聚集，这些人试图参加一项集体性的活动来展示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赞同或反对”。所有的示威活动至少要有 100 个参与者。Beissinger 将一个大众暴力事件定义为“一次大众的政治行动，它最初的目的旨在通过袭击人群或是侵犯财产等形式造成暴力后果”。暴力事件至少要有 15 名参与者。这一数据集没有包含绝食抗议和一般的罢工活动。见 Codebook, “Non-Violent Demonstrations and Mass Violent Events in the Former USSR, 1987–1992,” 4, 6. 如果想要更多了解关于在收集数据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见 Mark R. Beissinger, “Event Analysi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Acts of Dissent: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Protest* (Berlin: Sigma Press, 1998); Beissinger (fn. 63); 及 <http://www.polisci.wisc.edu/~beissinger/research.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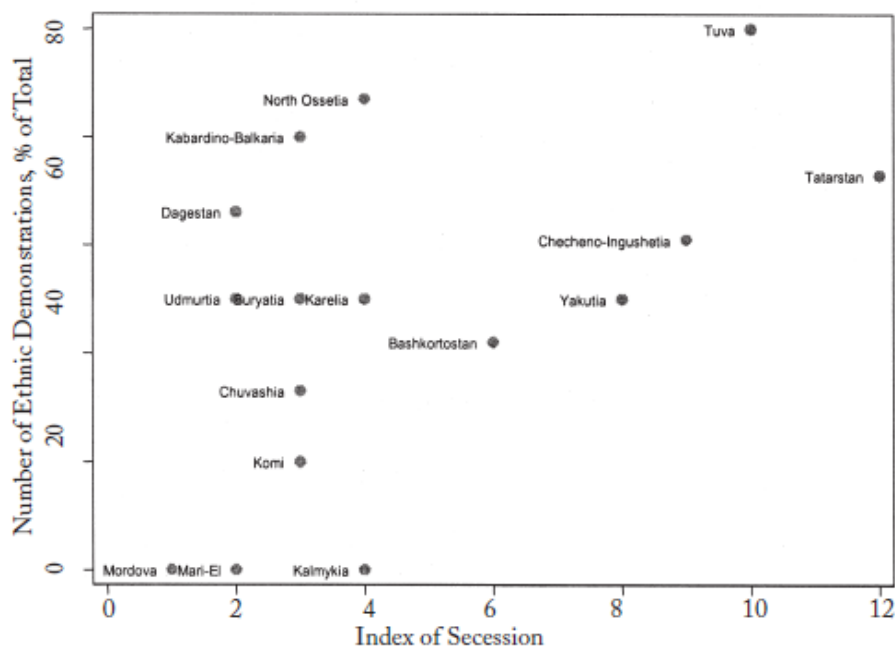


图 4.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全部示威活动中族群性示威所占百分比与分离主义指数的关系

在苏联后期及后苏联时期的早期，许多群体围绕着各种议题举行了很多大众抗议活动。考察所有抗议示威活动中族群性示威的百分比，我们在图 4 中会看到，这个变量与该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也存在相关关系 ($0.518; p \leq 0.05$)。在具有高度脱离倾向的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中，大多数的示威活动 (60% 到 100%) 关注族群问题。在具有一般脱离倾向的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中，40% 到 50% 的示威活动关注族群问题。我们注意到，三个北高加索的共和国达吉斯坦、巴尔克尔-巴尔科里亚和北奥赛梯都只有很低水平的分离主义，但是却有为数不少的族群性示威活动。这一现象可由以下事实加以解释，这些共和国中的示威活动关注的都是族群-民族主权之外的问题。例如，在这些共和国中，被斯大林驱逐的族群群体的遣返和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南奥赛梯共和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主要的议题。¹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族群性的示威活动围绕着族内冲突和对邻近的阿布哈兹人和南奥赛梯人的同情展开，并未发展成为分离主义。在 1987-1992 年间，几个共和国经历了族群性暴力活动。尽管并非全部的共和国都是如此，在某些共和国中，这种暴力活动确实与争取主权的运动有关。正如在图 5 中所展示的，发生暴力的族群性事件最多的共和国是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车臣-印古什 (21)、鞑靼斯坦 (6)、图瓦 (7) 和雅库特 (2)。比较而言，具有较低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在这段时期内则没有发生族群性暴力活动。北奥赛梯由于 1992 年夏天发生在印古什人和奥赛梯人之间的暴力性冲突，再次成为上述陈述的一个例外情况；它与争取主权的运动没有关系。²因此，大量的暴力事件与分离主义在统计上是相关的，但是比族群性的示威活动与分离主义之间的相关程度要弱 ($0.438; p \leq .10$)。

¹ 达吉斯坦中 Akkinty 与相邻的族裔群体的不和谐、巴尔克尔-巴尔科里亚中巴尔科里亚人对巴尔克尔人的挑战以及印古什人在北奥赛梯的 Prigorodnii 地区的宣称等都关涉到遣返这个问题。而关于区域性武装冲突的例子有，北奥赛梯通过接收奥赛梯难民并提供援助和志愿的战士，来支持南奥赛梯反对格鲁吉亚；还有巴尔克尔-巴尔科里亚站在阿布哈兹一边反对格鲁吉亚。见 Jane Omrod, "The North Caucasus: Confederation in Conflict,"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² Tomila Lankina 关于北奥赛梯的族群冲突与动员的讨论是 *Governing the Locals: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n Russia*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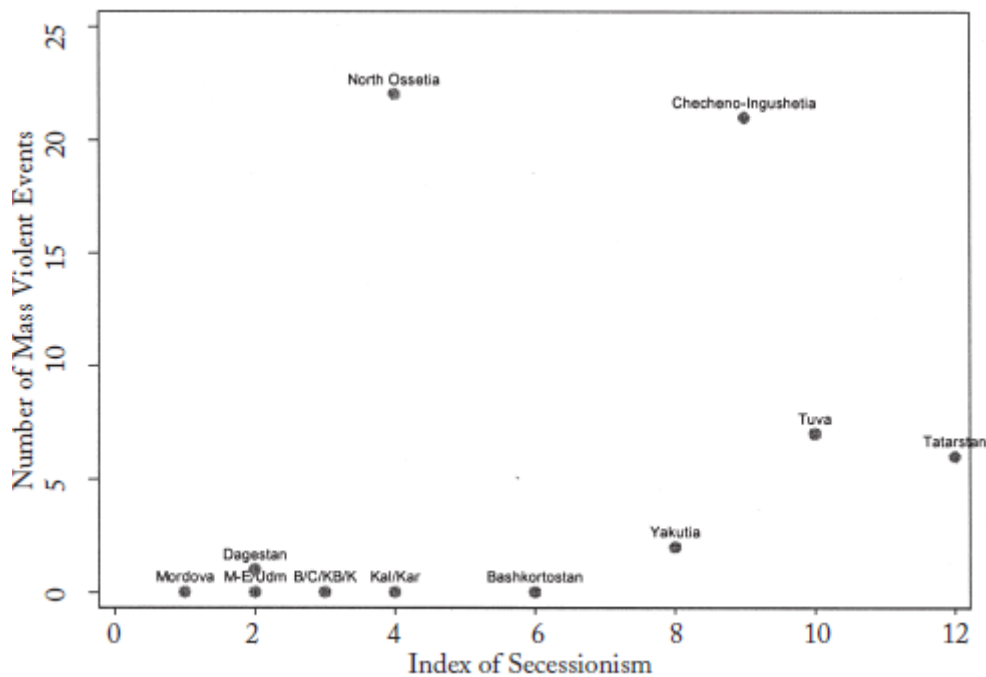


图 5.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族群性大众暴力事件的数量与分离主义指数的关系
 (注: 由于空间限制, 一些共和国的名称在图中被简化: M-E = Mari-El, Udm=Udmurtia, B=Buryatia, C=Chuvashia, KB=Kabardino-Balkaria, K=Komi, Kal= Kalmykia, Kar=Kare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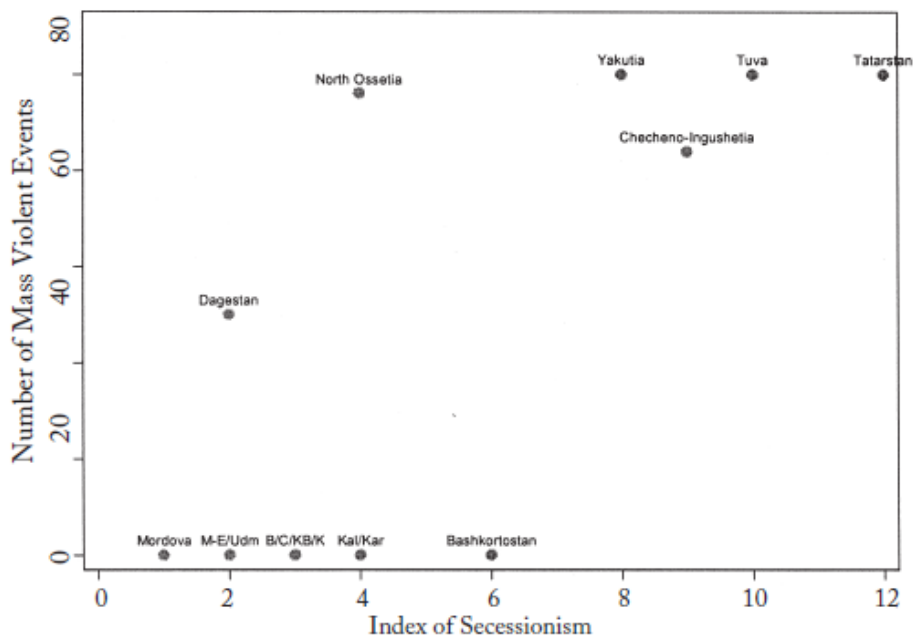


图 6.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全部大众暴力事件中族群性大众暴力事件所占百分比与分离主义指数的关系
 (注: 由于空间限制, 一些共和国的名称在图中被简化: M-E = Mari-El, Udm=Udmurtia, B=Buryatia, C=Chuvashia, KB=Kabardino-Balkaria, K=Komi, Kal= Kalmykia, Kar=Karelia.)

如果我们考察所有发生过的大众暴力事件中族群性暴力事件的百分比,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变量与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并且统计上显著程度很高的相关关系 (.768; $p \leq .0005$)。

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印古什和雅库特等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中，84%到100%的大众暴力事件都与族群性暴力有关（见图6）。达吉斯坦和北奥赛梯再次成为例外。

尽管示威活动和族群性暴力事件具有启发意义，他们作为大众民族主义的衡量指标仍旧是不完全的。个案研究的证据更加精确地为我们刻画出了在关键时刻，大众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各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接下来，我将比较三个在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方面存在差异的共和国：图瓦、雅库特和马里埃尔。图瓦和雅库特是这样一类共和国的典型代表，在这类共和国中，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向现任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用民族主义的政策并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相反地，马里埃尔是另外一类共和国的典型，在这类共和国中，低水平的民族主义运动使现任领导人可以忽略反对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保有他们的职务。¹ 除此之外，图瓦与雅库特的比较进一步否证了财富假设，因此这两个共和国在财富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却表现出相似的分离主义后果。分离主义在领土面积较小、经济不发达且资源贫瘠的图瓦共和国出现，同时也在面积较大且资源丰富的雅库特共和国出现。这一事实表明，财富这个变量在进行因果分析时所具有的解释力极为有限。最后，图瓦、雅库特和马里埃尔在大多数关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研究中都被忽视了，这些研究往往关注姿态鲜明的车臣和鞑靼斯坦，而忽视了民族主义运动水平较低的其他共和国。

图瓦共和国

图瓦是一个在1989年仅拥有309,000人口的西伯利亚小共和国，它的经济生产活动以传统的养殖羊、牛和马的畜牧业为主。它是一个具有高度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并且为本文的论点——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影响了共和国内争取主权地位的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² 首先，几位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在1990年和1993年被选入图瓦最高苏维埃，并且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取得了共和国中的最高职位——最高苏维埃的主席。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图瓦出现了水平极高的族群性暴力活动。第三，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影响了图瓦宪法的实质内容和采用，同样影响了反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投票活动。

随着1989年图瓦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 of Tuva）的形成，图瓦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人民阵线的领袖K. 毕尔岱（Kaadyr-ool Bicheldei）越来越受欢迎并且被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人民代表议会（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中图瓦共和国的代表。³ 与此同时，图瓦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 of Tuva）的10名成员在1990年举行的第一次竞争性选举中赢得了图瓦最高苏维埃中的席位。当图瓦保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D. 安达尔（Ondar）在1991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支持密谋政变者时，公众对毕尔岱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一系列抗议示威和绝食抗议随之而来，导致安达尔（Ondar）被驱逐并为毕尔岱所替代。随着毕尔岱的任命，图瓦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取得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最高职位的唯一的共和国。⁴

在1990年的夏天，在俄罗斯人和图瓦人之间爆发了大量剧烈的暴力冲突。⁵ 在一个工业城镇的迪斯科舞场发生了一场年轻图瓦人与俄罗斯“公共秩序志愿者”之间的对抗，紧接着，一伙图瓦人在城镇中散开，到处损毁财产、恐吓公众并攻击警察。暴力活动蔓延到其他城市。在首都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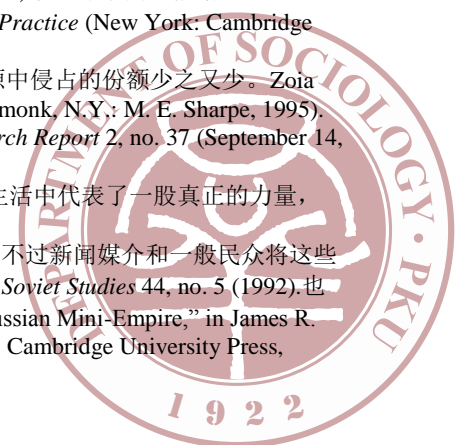
¹ 我使用多样案例方法（diverse-case method）和典型案例方法（typical-case method）来选择案例，根据的是 John Gerring 在他的下列著作中提出的类型学：《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² 莫斯科从图瓦这个俄罗斯最为贫穷的共和国切实拥有的金、铀、钴和煤等资源中侵占的份额少之又少。Zoya Anaibin, “Ethnic Relations in Tuva,” in Marjorie Balzer, ed., *Culture Incarn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³ Ann Sheehy, “Russians the Target of Interethnic Violence in Tuva,”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 37 (September 14, 1990).

⁴ 如一位俄罗斯分析家所言，图瓦大众战线由于大众的支持，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代表了一股真正的力量，Muzaev (fn. 61), 186–89.

⁵ 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暴力活动是否是图瓦人对图瓦人而不是族群间的。不过新闻媒介和一般民众将这些暴力活动认知为族群性暴力活动。Toomas Alatalu, “Tuva: A State Reawakens,” *Soviet Studies* 44, no. 5 (1992). 也见 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 “From Ethnicity to Nationalism: Turmoil in the Russian Mini-Empire,” in James R. Millar and Sharon L. Wolchik, eds., *The Social Legacy of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孜勒，图瓦帮派的成员向几名俄罗斯人射击，据称是因为他们不会讲图瓦语。在另外一个城市，图瓦人焚烧并袭击俄罗斯人的住处，留下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城镇。¹ 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G. 希尔申 (Gregorii Shirshin)，一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员，试图使图瓦人民战线 (Popular Front of Tuva) 名誉受损，他指责是这个团体煽动了反俄罗斯人的集体迫害。毕尔岱强烈抗议这一指责，要求克勃格 (KBG) 为他们正名，但是为了平息人们的关注，他还是决定正式解散他的组织。

两个新的民族主义组织围绕着解体的人民战线 (Popular Front) 出现了：温和的主权图瓦民族党 (National Party of Sovereign Tuva (NPST)) 和激进的自由图瓦人民战线 (Peoples' Front Khostug Tuva)。两个团体均只由图瓦人组成，并且都以强化共和国的主权为其奋斗目标。自由图瓦人民战线的成员主要是从共和国的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的年轻的无业者，它从 1992 年开始组织集会。NPST 则主要由专业政客和知识分子成员组成，它组织成一个捍卫图瓦主权的政党。NPST 在图瓦全境设立机构，并在 1993 年的选举中积极活动以求进入由最高苏维埃转变而来的最高会议 (The Supreme Khural)。这个党派在图瓦人中不断增长的权威转化成选举的成功：它在大众选举中赢得了 62.9% 的选票，并获得了会议中为政党保留的五个席位中的三个。在这同一个选举中，NPST 的一个领导人物同时也是俄罗斯科学院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图瓦分会的一位科学家阿拉克恰 (Kara-Kyz Dongakovy Arakchaa)，在俄罗斯杜马中获得了一个席位。

在 1993 年图瓦宪法的起草和采用过程中，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给共和国的政策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两个议题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成为公共讨论的核心：图瓦新宪法的问题与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脱离的权利。在一次全民公投之后，NPST 和自由图瓦都积极地为一项关于脱离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游说。² 脱离的议题在媒体和一般人群的“闲话家常 (kitchen conversation)”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相信，图瓦满足了由俄罗斯社会学家和人权倡导者 G. 斯达里多夫瓦塔夫 (Galina Starovoitova) 所阐明的关于脱离的三个必要条件：族群人口占大多数、国际性边界 (与蒙古) 以及过去的独立地位。³ 一位辩论期间其丈夫在图瓦议会服务的地方 (俄罗斯裔) 分析者指出，宪法的起草在民众中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到 1992 年，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同意宪法应该包含脱离的权利。

最高会议 (The Supreme Khural) 中的议员们注意到了公众的这一观点，并投票赞同一个关于脱离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对于莫斯科而言是一个警告，它表明，一旦图瓦的主权遭到侵犯，它将有可能选择脱离联邦。由于民族主义团体从一开始就已经为脱离的权利不断奔走呼号，他们将修正案的采纳当作他们运动的一个胜利。⁴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由民族主义者支持的修正案——对私人所有权的禁止法令——也在宪法中被采纳了，关于共和国法律拥有相对于联邦法律的优先地位的主张同样如此。

NPST 同样也致力于反对俄罗斯的联邦宪法。在 1993 年秋天它发起了反对实施这一宪法的示威活动。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当联邦宪法和图瓦宪法在同一天举行直接投票时，图瓦人口的大多数投票支持图瓦宪法 (53.9%) 同时反对联邦宪法。仅有 29.8% 图瓦人投票对联邦宪法表示赞同。⁵ 这些投票的结果表明，图瓦人支持关于脱离的修正案、对私人所有权的禁止法令及于共和国法律拥有相对于联邦法律的优先地位等民族主义政策。⁶

¹ 整体而言，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估计大约 10,000 俄罗斯人，包括高度熟练的工程师、教师和医生迁移出图瓦。Stefan Sulliv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Tuv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8, no. 1 (1995).

² 自由图瓦更进一步，要求共和国立即举行一场关于从俄罗斯分离的全民公决；Drobizheva (fn. 18), 125.

³ 1989 年图瓦人与俄罗斯人在总人口中分别占 65% 和 32%。当它作为苏联的一个部分时，图瓦在 1921 到 1944 年间名义上是独立的。1921 年之前，它拥有俄罗斯保护国的地位。Balzer (fn. 71), 124.

⁴ Anaibin (fn. 68), 104, 110.

⁵ 这场民众选举发生在 1993 年 12 月 12 日。图瓦最高会议已经在这一年 10 月选举采用了图瓦宪法，当时叶利钦正忙于轰炸联邦议会。A. Kuzhuget and M. Tatarintseva, *Etnopoliticheskaia situatsiia v Respublike Tyva*, Research Monograph, no. 74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9.

⁶ Ann Sheehy, "Tuva Adopts New Constitution," *RFE/RL Daily Report* no. 203 (October 26, 1993), 2.



尽管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对共和国政治造成了影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图瓦共和国的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正在衰退。¹这一结果与叶利钦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强化一起，开始将政治权力从毕尔岱领导的议会转移到行政机构。图瓦的新总统欧萨克（Ool Orzhak）通过为民族主义领袖提供政府职位将他们笼络住了。无论如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图瓦的自治运动中，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民众中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且能够显著地影响共和国的政策。

雅库特共和国

雅库特是俄罗斯的另一个分离主义共和国，它向俄罗斯要求控制自己经济的权力，包括其境内自然资源的销售。依据常规化的思路，钻石、金矿和煤矿的存在激励了雅库特的领导人们提出分离的要求。²但是我认为，分离主义关键性的决定因子是对雅库特民族主义运动的大众支持的出现，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对共和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证据在于，首先，将民族主义候选人选入共和国的立法机构；第二，中等水平的民众运动，包括示威、罢工和偶尔的族群暴力；第三，围绕雅库特宪法的实施，公众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施加的压力。

雅库特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义团体是温和的庇护组织萨哈部落（Sakha Omuk，又称 the Sakha People）和更为激进的萨哈视角（Sakha Keskile，又称 Sakha Perspective）。萨哈视角为雅库特倡导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并积极地支持共和国取得主权。他的发起者语言学家 Lazar Afanas'ev，简洁地将他们的立场总结为：“反对掌权者的锋利（Sharp）政治”。1991 年政变期间这个团体对叶利钦的支持导致雅库特共产党组织将萨哈视角的成员从他们在省级共和国城市中的工作岗位开除，就是为了抑制这一团体不断增加的影响力。³温和的团体萨哈部落（Sakha Omuk）倡导萨哈（Sakha）民族文化的重生以及在共和国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最高层级中雅库特人更大的代表性；它同样也要求雅库特从他的自然资源中保留更大份额。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开始赢得大众支持。萨哈部落（Sakha Omuk）的几位候选人在雅库特全境被选入了地方苏维埃并在 1990 年被选入了最高苏维埃。尽管党的特权体系（nomenklatura）继续占据支配地位，雅库特民族主义者与最高苏维埃中的民主党人联手，在 1990 年宣称其共和国的主权地位。⁴萨哈部落（Sakha Omuk）为尼古拉耶夫（Mikhail Nikolaev）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进行游说。尼古拉耶夫是苏联时代的产品，他刚刚已经被选举为雅库特 1990 年重新组建的最高苏维埃的主席。当一年以后共和国总统作为最高职务被创造出来，尼古拉耶夫在普选中得到了大多数选票（76.7%）。民族主义者支持尼古拉耶夫是因为他支持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主权方面争取更大利益的主张，同时因为他是一个雅库特人，因而满足了雅库特总统必须能说雅库特语的要求。⁵

考虑到大众活动时，在雅库特有几起相互分离的族际暴力实例。M. 鲍尔泽（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指出，存在于雅库特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日常的族际紧张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几个时间点上容易爆发成暴力性冲突。⁶同时雅库特的煤矿、钻石矿和金矿工人们在苏联最后几年开始进行罢工。举例来说，1990 年，在大多数矿工都是新近的俄罗斯裔移民的米尔内

¹ 我在我书的原稿中讲述了这种大众民族主义衰退的现象。见Giuliano, “Why Secession Fails: The Rise and Fall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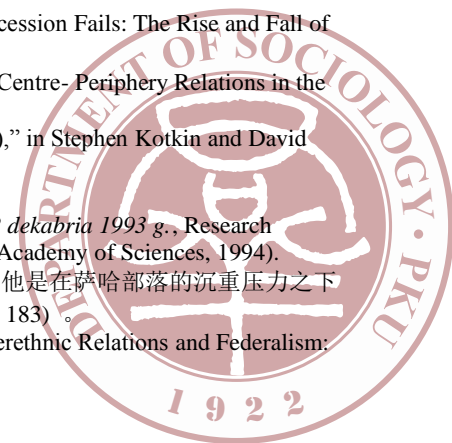
² 比如说见Daniel R. Kempton, “The Republic of Sakha (Yakutia): The Evolution of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48 (June 1996).

³ 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 “A State within a State: The Sakha Republic (Yakutia),”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⁴ 在宣称其主权地位之后，雅库特将它的名字改为萨哈共和国（雅库特）

⁵ F. M. Zykov, *Etnopoliticheskaia situatsiia v Respublike Sakha do i posle vyborov 12 dekabria 1993 g.*, Research Monograph, no. 71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Khazanov (fn. 12) 写到，尼古拉耶夫“（在与叶利钦谈判的过程中）喜欢指出他是在萨哈部落的沉重压力之下采取行动的，并且，雅库特议会的一些决定是与他本人的意愿相违背的”（p. 183）。

⁶ 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 and Uliana Alekseevna Vinokurova, “Nationalism,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Federalism: The Case of the Sakha Republic (Yakutia),” *Europe-Asia Studies* 48 (January 1996).



(Mirny) 这个钻石开采城镇，一场短期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宣称从雅库特脱离并创建“勒那共和国 (Lena Republic)”。由于民族主义运动没有选择大众抗议集会作为行动的策略，发生在雅库特的示威活动的数量相对要少。但是，1992 年举行的一场示威表明，公众观点的强烈表达是如何在关键时刻影响共和国的政策，这一政策事件就是对雅库特宪法的投票。

到 1992 年春天，雅库特的议会和民众已经对是否需要采用一部宪法考虑了一段时间，雅库特采用宪法这一行动将有可能是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间最早的此类行动。一般民众尤其是雅库特人积极参与到对这一行动的讨论中。有两个争论的主要问题：共和国的宪法应该在俄罗斯联邦宪法之前还是之后通过？是否应该纳入脱离的权力？当最高苏维埃于四月开始开会的时候，民众中对于宪法将被通过的期望已经出现。当议会明显倾向于让莫斯科先举行对联邦宪法的选举时，民族主义团体在议会厅前组织了一场大众游行，要求立即通过包含有保证脱离权力的修正案的共和国宪法。这场集会的参与程度很高，不仅有雅库特知识分子，也有来自民族主义学生组织 Eder Saas 年轻人。集会中的抗议者威胁到，如果不举行宪法投票，他们将会用最高苏维埃的副主席取代主席。¹

作为对这种压力的回应，议会马上举行了是否通过宪法的投票并采纳了关于脱离的有争议的条款。萨哈视角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促使最高苏维埃满足这一团体所要求的关于脱离的宪法性权利。然而，萨哈视角的另外一个要求，即雅库特民族被标识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的要求被否决了。无论如何，总体而言，雅库特宪法的通过代表着各共和国中一起极其重要的象征性事件，在此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紧张的全国性讨论持续了约一年半的时间。雅库特的宪法宣称该共和国法律拥有相对于联邦法律的优先地位，并且提供了脱离的权利。民族主义者将宪法的通过视作他们的胜利，并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公共节日 (vsyenarodnaia)，人们在节日中庆祝久被期待的宪法的通过。²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普及程度开始衰退。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所享有的可观的民众支持使它得以影响了共和国的关键政策。

马里埃尔共和国

在马里埃尔的人口中，俄罗斯人与马里人大致相等，属于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分离主义倾向最低的共和国之一。在 1990 年的主权声明之后，它的领导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主动性。举例来说，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未能通过一项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起草的语言法草案，并且直到 1997 年都未能采用一部新宪法。³ 马里埃尔有两个民族主义组织，它们都缺少公众的支持，这可以从极少的民众游行、没有族群性冲突以及民族主义者在选举上鲜少的胜利还有对共和国政策影响的缺失这些现象中看出来。

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祖居之地** (Kugeze Mlande, 又称 the Land of Ancestor) 主张从俄罗斯分离出来，倡导排外的移民法律。**祖居之地**引起争议的言论和集会为它吸引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它并不受大众欢迎并且从未在控制民族主义运动方面取得成功。⁴温和的民族主义组织**马里联盟** (Mari Ushem) 和其他共和国一样，支持共和国获得主权、要求马里语的国家地位、文化的复兴以及俄罗斯化的终止。但是，马里联盟没有选择使自己成为一种反对派势力，并从一开始就与地方领导人合作。

根据一位研究共和国政治的地方专家的说法，马里联盟对公众观点的影响十分微弱，尽管大多数人尤其是马里人都很熟悉这个团体。⁵首先，马里联盟在共和国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支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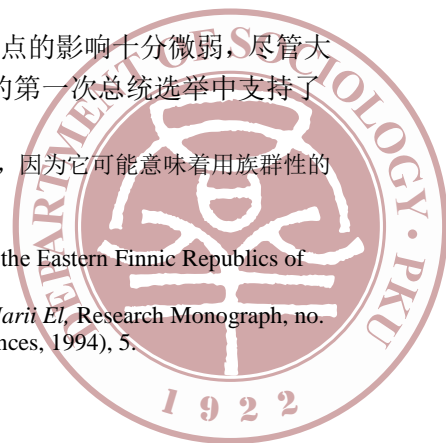
¹ Drobizheva (fn. 18) 指出，这一威胁表明在雅库特人中存在一种非常激进的情绪，因为它可能意味着用族群性的俄罗斯来替代雅库特 (pp. 135–52)。

² 同上，137；也见 Muzaev (fn. 61), 206–10。

³ 马里埃尔于 1995 年通过了一部语言法。Iurii P. Shabaev, “National Movements in the Eastern Finnic Republics of Rossiia,”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 of Eurasia* 37 (Fall 1998)。

⁴ Muzaev (fn. 61), 159–63; V. D. Sharov, *Emopoliticheskaia situatsiia v Respublike Marii El*, Research Monograph, no. 63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5。

⁵ Sharov (fn. 87), 15。



落选的候选人。¹ 第二，1993 年联邦杜马与马里埃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结果都证明了这个团体影响力的缺乏：只有一位马里联盟的成员获得了杜马席位，它的五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被选入最高苏维埃。而激进团体**祖居之地**没有赢得任何席位。

马里联盟主要的主动行为发生在 1992 年春天，它组织了一次“马里民族第一次议会（First Congress of the Mari nation）”。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这些决议要求马里人在政府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并且将马里人鉴别为“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中的民族性（National）少数群体”。但是马里议会依然是温和的，它反对脱离并支持叶利钦的联邦协定，这一协定将会成为俄罗斯宪法的一部分。在随后的秋天，共和国管理机构与民族主义者合作，它决定“将民族主义运动合法化为马里民族的民族代表组织”，这一组织通过了一些与之前在马里联盟的议会中相同的决议。尽管一些政府官员同时也是马里议会的领导人，另一些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却向总统佐京（Zotin）发出了一个正式抗议，声称由这个议会通过的决议与先前存在的机构和法律相矛盾。作为回应，佐京将这个议会通过的决议印刷出版，与之一起出版的还有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指出这些决议仅仅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建议，并且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并不和这个团体有同样的倾向性。

1993 年以后，马里联盟开始主要关注语言和教育问题。²从根本上而言，只有一小部分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支持了马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当其成员们停止参与选举并向其他选区迁移时，这两个民族主义团体都显著减少了他们的活动。³

对案例研究的总结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图瓦和雅库特民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促进了他们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在那些未能提出分离要求的共和国，比如马里埃尔，大众民族主义明显缺失。因此，由大众做出的政治决定和这些决定对共和国内各种势力相互竞争的局面的影响，能够解释俄罗斯各共和国中分离主义的变化。

第四部分 结论

这篇文章提出，联邦内各区域中的政治状况影响了当地民族主义的发展。上文中已经表明，多族群的联邦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过程创造出了一些可能会鼓励区域分离主义的条件。具体而言，政治责任由中央政权向地方的转移转变了地方领导人的动机，迫使他们为保住自己职位而必须对地方的选民做出反应。如果这些选民希望自治，地方领导人就必须对这种愿望做出回应，制造分离主义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策略，它更是一个为了领导人自己政治生存的必然选择。民主化将行政区域变成了选举性的政治舞台。在俄罗斯，族群性的共和国变成了选举性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民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迫使地方领导人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因此，在联邦内对各区域政治控制的竞争是驱动区域性分离的重要变量。

这些发现对其他关心防止分离的文化多元社会（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具有启发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俄罗斯出现的要求主权的不稳定运动这一事实意味着，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多族群的国家应当避免设立与社会承认的族群或宗教共同体相重合的次联邦地域结构。俄罗斯联邦诸共和国不同水平的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共和国内最终的衰退都表明，分离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它依赖于次联邦区域内大众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强度。本文主张，大众民族主义既不是联邦各区域内的一种潜在态度，不是自然资源资产的简单函数，也不是一种被地方领导人操纵的被召唤出来的某种东西。同样地，注意力应该被导向理解在族群-联邦的国家中民众民族主义的起源，还有它在这些共和国中在精英权力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¹ Muzaev (fn. 61), 160–61.

² Ronald Wixman and Allen Frank, “The Middle Volga: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Sovereignty,” in Bremmer and Taras (fn. 65).

³ Muzaev (fn. 61), 162

